

本书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提出，它发生在一个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作家身上，却贯穿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诗歌和现代翻译文学，在整体上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联系，其核心内涵是“诗”与“散文”的关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更进一步衍生了它的悖论表现。

#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Wenxueshishang de Shizongzhe Mumutian

陈方竞 著

穆木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Wenxueshishang de Shizongzhe Mumutian

陈方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穆木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陈方竞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301-12870-1

I. 文… II. 陈… III. 穆木天(1900—1971)—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595 号

书 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著作责任者:陈方竞 著

责任编辑:艾 英

封面设计:海风书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2870-1/I·198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6.25 印张 425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自序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鲁迅研究上陷于困境,备感艰难,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可能更适合研究穆木天。”我与穆木天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近二十年来未曾中断,而成为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与穆木天的相遇完全是偶然的,当初作为课题去研究他,是一种缺乏学术冲动的选择。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七七届”留校生,我还在吉林师范学院工作,当时我们这些早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教师,不仅最起码、最切己的生活条件尚不具备,就是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自主性”或“主动性”的。那时候的起步要靠某种“缘”,即你的老师的研究对你的影响,你能不能抓住并走进这种影响。我遇到了索荣昌老师,他是从东北师范大学调来的长我近二十岁的老教师,他最初开的课是“鲁迅研究”,使我感到亲切,但我很快发现他实际上把主要精力放到对穆木天的作品和生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造就的那种有些“古板”却又让人感到“亲近”的“老头”,我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体味他那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有时又对他那种使我感到有些“苛刻”的严格要求不无怨言。他与穆木天“同乡”,是吉林省伊通县(市)人,研究穆木天自然寄寓着那份别人不具备的“乡情”,但我以为他当时在学术研究上受“天时”、“地利”等诸方面因素的限制,所作出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且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学术界关注穆木天的研究者能有几人?他经过中国“传统”的学术训练,对资料极其看重,为搜集资料同时也为了使这一研究更好地展开,他结

识了杨占升等老先生，得到了杨占升先生的支持，他与当时在学界埋头于学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且关注穆木天的蔡清富、李伟江、张大明等我素所佩服的先生们建立了很朴实的友谊，又与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始终保持着联系，在他们的努力下，穆木天研究资料发掘和整理的丰富和完备，在当时更关注鲁、郭、茅、巴、老、曹等显著作家，且又为郁达夫、沈从文等一个个新的“研究热点”所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很难想象的。索老师虽为人谦和，但与《吉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黄湛先生一样，有着把研究作为“事业”来做的坚韧品格和气魄，经申报“穆木天研究”作为省社科重点项目立项，他们在吉林师院学报上开辟了“穆木天研究”专栏，在全国扶持了一批穆木天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持续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深化了研究又极大地提高了该学报的知名度。1990年秋在条件成熟时，他们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穆木天学术研讨会”，会后又为《穆木天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下“被动”地走进了穆木天研究。我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85年，是索荣昌老师布置我写的对穆木天第二部诗集《流亡者之歌》的介绍和评述，所以说“被动”，是因为我当时从华中师大学习回来，正着手鲁迅与郭沫若比较研究，对穆木天了解不多，是“老师让我做”，还不是“我自己愿意做”。当然也有着“以鲁视穆”的心态，我在《鲁迅与浙东文化》<sup>①</sup>一书的“后记”中是这样说的：“我写过一篇对‘以鲁视郭’研究心态的批评文章，但‘以鲁视穆’的研究心态在我身上仍然存在——我把穆木天看‘小’了，这是我的鲁迅研究带来的‘陷阱’。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具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都有自己个性存在的位置，是别的作家所不能取代的。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作品进入到他独有的世界中。在我的研究视野中，由于不能把穆木天与鲁迅平等看待，不能通读穆木天的全部著述，立足于‘这一个’来认识他，他的世界对我是关闭的，我写的那些文章其实是外在于他的世界的。”对我而言，走近穆木天是需要一个艰难过程的，穆木天通晓法、日、英、俄四种外语，在诗歌创作、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翻译等诸方面都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具有“五四”孕育的

① 1997年完成，1999年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那代人的“百科全书”特征,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多少有了一些自我意识的我所根本无法相类比的。后来,《新文学史料》邀我写《穆木天传略》,“我认真地阅读了可以搜集到的穆木天的著述和研究资料,真正地感到了进入他本有的世界的艰难,在我的感觉中这近于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鲁迅与浙东文化·后记》)。当我进入到穆木天的世界中,发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某种典型性,他留学日本时期自然形成的与法国文学的联系,特别是1926年他的文学批评即使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也有其独到的价值,我是那样激动和兴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穆木天研究中度过的。我愿意记住这个过程,尽管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一些认识是有些幼稚的。

在我看来,作家研究,首先应该为这个作家编出年谱或传略,这是研究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研究者几乎都是从作家研究起步的(这与后来的研究者有些不同),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又几乎都是从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阅读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史料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的研究的深化,我认为,不仅是对作家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发现,而且是对研究者“自身”的某种“情结”的发现,后者对于研究者的研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够真正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是否能够把作家留下来的文字转化为自己生命的“血肉”,可能更为关键,当然,对“自身情结”的发现,又是研究者在研究状态中实现的,是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实现的。我真正走进穆木天研究,就是在编他的著译年表和着手他的传记写作的过程中。当时,索荣昌老师把他多年来搜集到的穆木天的全部作品和生平史料无保留地给了我,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我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更打动我并触动我深入思考的,是穆木天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及相关材料。我很快写出了《人生道路的起点——穆木天在故乡》<sup>①</sup>和《变革时代的选择——穆木天在天津》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写前一篇,我真正地有些投入而开始喜欢这个作家了,一万多字的篇幅两天就写出来了,写的过程中眼前不由自主地时时被记忆中的一幅幅画面所萦绕,那些我熟悉的但又多少有些感到陌生的生活场景在撞击我,摆脱不开,这就是我曾经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雄心壮志”,在吉林省桦甸县的山区经历了五年的“知青”生活,我真

<sup>①</sup> 发表于《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的是把自己的“根”扎在了那片土地中,它成为我一生的记忆中最能触发我的思考力和想象力的“经历”之一,成为我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当然,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对穆木天的早年生活产生一些感同身受的体验的原因之一。此外,我的妻子是满族人,这使我结识了相当多的始终为我所敬重的有“老吉林”之称的满族人,他们经常谈到这座古老的“江城”的历史和风俗习惯,谈到穆木天在吉林市的生活佚事,这些,也有助于我去接近穆木天。而且,他人难以想象,这种使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结”,同时又是我当时正在思考和写作的《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内在推动力之一,即鲁迅作品中再现的他的早年生活,早年生活中蕴含着的贯穿于他的创作并为他有意凸现的“浙东特殊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我对这种影响的发现与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结”之间产生了唯我才能感受到的某种“同构”——这,对我当时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记得与钱理群老师结识后,他对我有这样一个认识,即我不属于那种才华横溢、富有灵气的“才子型”学者,靠的是“勤奋”,所以“应不求一日之功,而要积以日时,方见成效”。我给研究生上课经常讲,研究过程就是与研究对象的“磨合”过程,“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就我而言,这个过程常常像我“上山下乡”时铭记不忘的毛泽东那句“痛苦的磨练”的话,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一旦有了出版的可能就开始了自己的漫漫“长征路”,写的过程特别艰难,这样的长期体验,使我甚至有些“偏爱”这样的写作方式,一旦进入状态,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搞得行若“僧人”,“拼命地做”,似乎不这样就买不到研究对象发放的进入他内心世界的“门票”,自认书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鲁迅与浙东文化》是这样,《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这样,对《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注释校勘是这样,其他的书和文章也是这样。这本《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更是这样。

1995年我在写《穆木天传略》时,开始意识到研究穆木天的价值和意义。当时主要着眼于他的文学批评,家居斗室,女儿即将高考,是在学生放暑假时借教学楼的一个小教室写出《论穆木天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这篇文章的,但写出后即碰了“壁”,无处发表。在我研究起步的近十年的时间里,每每最困难的时候,都得到钱理群老师的热情鼓励、语重心长的告诫和没有任何所求的帮助,那一次他又帮助我找回了自信。正因为有了这番努

力,我在《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对穆木天与创造社、与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有了这个基础,2004年,在有可能出版的情况下,我决定写这本书,设计中的三章,除了外国文学翻译一章,其他的我都有现成的文章,觉得把它们在内容上统一起来,在文字上作些润色,再补写一章,即可完成。但当我把发表的文章扫描出来与后来写的加以组接后,很不满意,发现这构不成我感觉和认识中的穆木天,决定推倒重写。当时写得很顺,书还没有写完,就写出了这篇长长的自序(收入我的“自选集”,本书未用),我为我走出长期以来“内向”的研究方式和改变了我的研究更局限于所熟悉的领域的不足而感到兴奋,相应地还写了一些其他文章,当时的自我感觉是相当良好的。但长期的研究体验告诉我,我不是那种“厚积薄发”可以“水到渠成”的那种研究者,这种心态和写作状态在我身上出现是不正常的,我要受“惩罚”的。

2006年开春,因为父亲做心脏搭桥手术,我在南京第一医院陪护,得以与我在南京大学的同学陈雪岭有了难得的几次倾心长谈。他也是曾经给予我最多鼓励和帮助的朋友,我们谈的更多是各自的学术研究体验,由于在研究起点上有相通之处以及长期的书信往来,这种交流对我的触动是相当大的。我开始意识到这本书的研究框架和思路与研究对象相脱节的问题,问题仍然发生在“以‘鲁’视‘穆’”上,但与过去不同,过去是怕把穆木天看“小”了,努力发掘他“这一个”应该有的价值,现在是把他看“大”了,是微言大义,更严重地离开了研究对象,这是十分可怕的。唯一的出路是回到自己的切实感受和认识上,“从新来过”。我重新翻阅了自己积累的全部资料,在我的中国现代文学藏书中,创造社期刊是最全的,这对我重新认识穆木天诗歌和诗论的独特性形成的根源,他之作为创造社“京都”作家的特点及其对新诗发展的独到意义,以及他与创造社作家一致存在的难以克服的缺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酷暑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我完成了这本书的重写。在这一过程中,我的母校学报的李开拓先生、《汕头大学学报》的翁亦波先生、《华文文学》的易崇辉先生和海南师大的毕光明先生,提供了不少版面发表我的这些很难为他们所主持刊物带来“影响”的文章,汕头大学文学院老师还有我的学生陈红旗博士以及研究生汤灿、陈海东等,也曾给我各种帮助与鼓励,与他们之间的友谊,增添了我写好本书的力量。

## 二

写完这本书,我并没有感到轻松,真正发现自己面对穆木天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局限和障碍。我学生时代曾经写过诗歌,也喜欢读诗,熟悉的是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也喜欢李瑛的诗,能一首一首背诵,曾经写的也多是这样的诗,但这些诗与穆木天的“诗”有根本不同的一面,实际上,我这一代人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大批判文章加之各种肉体的和心灵的磨难,不能不远离能够鉴赏这种“诗”的有如高山泉水一般清新、澄澈的心灵,更不要说那种开阔的视阈和高远的想象,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我走进穆木天的“诗”和“诗论”的可能。这里还有一个更是我后来在研究中认识到的问题,就是穆木天作为“五四”的产儿,他与法国文学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多见,正是这种联系使他的诗歌和诗论在那个时代最大程度地显现了“诗”与“散文”的根本不同——显然,切实感受、认识和阐释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相当艰难的,我始终难以摆脱从“散文”的角度思考和阐释穆木天诗歌和诗论的局限,无法与穆木天进行真正的“对话”。我甚至一度对自己的感受和阐释能力都产生了怀疑,所做的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留下了诸多遗憾,所以至今我也没有放弃这个课题,还想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此相关的是,我同样不具备研究具有“百科全书”特点的穆木天的外国文学翻译的素质和能力,与我父亲和我女儿这两代人不同,我所属“知青”中“老三届”一代人似乎命定就与外语无缘,我学过俄语,又学过英语,“文革”后留下的仅仅是几个发音不准的单词,几乎是从头学起,但对域外文学的语言感觉能力仍显不足,这不能不限制我对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在这里,要感谢王德胜先生早在1990年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付诸相当大的努力写出的《不该遗忘的角落——略论穆木天的文学翻译》<sup>①</sup>,我的研究是在他这篇文章基础上展开的),也影响了我对他的诗论及诗歌的认识与理解,虽然我对此做了很多准备,写的过程也是勉力为之。当然,局限又不仅仅是“知识结

---

① 该文收入《穆木天研究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构”上的,人的主体往往是话语产生的效果而非话语的生产者,这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影响着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包括我的这本书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因此,我把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看成仅仅是自我主体精神和话语建构过程中迈出的一步,仅此一步,就感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对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仍然是感到欣慰的。我很少写日记,却在2005年8月25日晚写了如下文字:“下午3时,深圳的杨红雨来电话,告知索荣昌老师昨天故去,立即往索老师家中打电话,其长子索松华接,知小脑萎缩加之前列腺等病困扰而逝;我南下就职汕头大学前曾去母校探望老师,即见师身体甚差,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正在写《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一时无语,脑中时时浮现老师面容,老师是穆木天研究的开拓者,寄希望于我对这一研究有所拓展,原想此书出版后可给老师一阅,弟子未负师之愿,现此书只能告慰于老师的在天之灵。想到为穆木天研究做出贡献的李伟江先生、蔡清富先生,都先索荣昌老师故去,不胜感慨。”李伟江、蔡清富诸先生也都曾在给我的信中寄以希望,本书完成了一个长期以来埋在我内心深处的“负债”似的“宿愿”。

本书更主要实现了我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自我超越。在我的那本“自选集”的“自序”中谈到的难以实现自我超越的学术研究困境,是在写完《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后出现的,这本书在与新文化倡导群体(即“校”、“刊”和“S会馆”)的内部比较中深化了我对鲁迅的认识,抒发和阐释了我的“‘五四’情结”,但在客观上却带来我面对更多的中国现代作家难以产生阅读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冲动,对别人的不同于自己的学术选择和认识也难给以真正的同情、尊重和理解,常常“不屑一顾”甚至“反感”,这带来的是我自己的研究困境,常常为自己下一步的选择感到茫然,更严重的是我对这一困境是怎样产生的又无从认识,它沉重地压在我内心,想摆脱而不能。这种状况直至我落脚于汕头大学文学院这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与王富仁老师频繁的接触和攀谈中,特别是读了《“新国学”论纲》等一系列文章才有所改变,对其根源也逐渐有了一些认识。《鲁迅与浙东文化》如钱理群老师在“序”中所说贯穿着“艰苦的‘剥离’”,他在肯定我“经过层层‘剥笋’式的研究”所带来的思考和认识的深化的同时,提出:“我想,这会不会在另一方面对他的学术造成某种损伤呢?——这大概也是一个逆向的质问吧?其

实我们已经多少感觉到作者的论述或入场过于‘紧’了，似乎缺少点从容的风致。其实鲁迅自己也说过，人生、作文都要有‘余裕’，‘太逼促’是不可取的。我这样说，实在是一个苛求，执着中的从容，是一个更高的学术的境界，思想的境界，我自己也只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就算是一个朋友的祝愿吧。”这种“诤友”之言语重心长，是一针见血的，但我当时对此显然缺乏真正理解，当然，当时所处环境和心态也一定程度限制了我的理解。《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sup>①</sup>的研究框架更进一步立足于“剥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建立起来，如我在该书“自序”中所说：本书“面对‘众声喧哗’的‘五四’，不仅辨析出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与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之异同，而且剥离出在‘五四’话语中心存在着‘S会馆’的独异之声，其与‘刊’和‘校’鼎足而立，进而提出了三者之间尤其是‘S会馆’之于‘一校一刊’相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峙与抗衡的一面；更进一步，又提出‘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存在着鲁迅与钱玄同尤其是周作人之间的‘异’中之同特别是同中之‘异’，而这‘异’又是一种根本之‘异’——由此在‘五四’的‘众声喧哗’中展示出不同层面上的‘多重对话’”。显然，这种“剥离”即“分”是必要的，带来我思考的深入，但我却难以在“分”的基础上把他们“合”起来，我把他们打“散”了，展示出他们各自的“五四”话语的个性差异，却也使他们在我的描述中成了一个难以结构在一起的孤立的个体。我在揭示鲁迅特有的个性话语时至今日仍葆有的撞击我们生命感觉的巨大力量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了其他新文化倡导者的“五四”个性话语的生命力，而把鲁迅最终置于一个与他人难以相“感应”以致难以相“呼应”的境地，这种研究在“微观”层面触摸到了“五四”较少为人关注的内涵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有所遗漏，使我并非自觉地在“宏观”上离更是在整体上显示变革意义的“五四”远了，这实际上也使我难以察觉地离鲁迅远了。所以，近日读钱理群老师的《学术诤友，坚守与宽容：解志熙对我的提醒和我对解志熙的提醒》<sup>②</sup>一文，对我的触动是相当大的，我在很多方面是接近志熙的，而且，这许多方面也是近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我在研究和写作中有所坚持又有所变化的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 5 期。

方面,这贯穿了本书几易其稿的写作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这篇文章中,以及我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中,更增强了对这些方面思考和认识的自觉性。

### 三

实际上,本书与《鲁迅与浙东文化》、《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存在着内在一致的追求,这不仅体现在我对穆木天的研究仍然结合鲁迅展开,在充分认识他们之间的“诗”与“散文”的不同基础上,集中思考的就是他们在矛盾和差异中的统一;更主要的是,我选择和研究的仍然是一个“典型现象”,这种选择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心灵的探寻》(钱理群著)推出的“我之鲁迅观”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给我极大启示”(《鲁迅与浙东文化·后记》)。《鲁迅与浙东文化》针对“鲁迅与浙东特殊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关系”的形成和表现展开并延伸出去,提出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浙东背景”,《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针对“‘五四’话语”的多方面构成与碰撞展开并延伸开来,进一步揭示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多重对话”中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这两本书都是立足于鲁迅展开的,其由“点”到“面”的研究思路具有明显的“内向性”思考特征。“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同样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提出的,却更加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它发生在一个容易为我们忽略的作家身上,贯穿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诗歌和现代翻译文学,在整体上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联系,其核心内涵是“诗”与“散文”的关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进一步衍生了它的双重内涵的悖论表现,即,一方面它在“五四”背景下生成,具有着至今仍然使我们感到无法重复和难以超越的价值和意义,而为我们的文学史描述所遮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和阐释重新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又是通过研究对象本身在文学史上消失的,其深层根源更在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在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史思考和认识之中。这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分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是相互攀结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正因为有了‘我’,才会产生‘你’”,显现出现象形态的

丰富性与复杂性,因而带来阐释的难度,同时也具有了吸引我们对此进行思考和探寻的魅力。

“诗”与“散文”作为文学中最具有对应性的两大门类,是截然有别的两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英国视觉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认识中,“形式,是指艺术品内的各个部分和质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这种纯粹的关系仅向有审美力的人展示”,“意味,则是指一种极为特殊的,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在贝尔看来,“真正的艺术中都隐藏着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味”。<sup>①</sup>可见,“形式”对于区分“诗”与“散文”这两种截然有别的文体,具有首要的意义,是“诗”与“散文”建设更具根本性的因素,这不仅是在欧洲文学发展中提出的,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这种艺术审美形式上的自觉意识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革新意义更重要的体现。在我们的感觉中,中国古代更是一个诗的国家,更是一个盛产散文的民族,实际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是极不利于诗歌和散文的审美形式发展的,原因在于,我们把唐代及其以前适宜诗歌和散文发展的几百年置换了不适宜诗歌和散文发展的上千年,把适宜诗歌或者散文发展的个别性因素置换了不适宜诗歌或者散文发展的整体性因素;我认为,直接压抑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就是作为中国社会文化表现的散文,更是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文以载道”的散文,这种散文同时抑制了叙事文学的独立发展,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并没有在《史记》基础上真正发展起来,因此,时至清末,中国文学发展出的是一种丧失了内在生命力的散文。“五四”实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革新,却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中国文学的这种状态,“五四”更是一场散文的革命,这发展了在古代受到束缚而没有发展起来的散文,但叙事文学并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现代诗歌独立发展之不足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加之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中国社会文化的枯燥,以及贯穿着的“舆论一律”的社会生活方式,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文学的社会文化性质,加强了散文对“诗”的排斥以及叙事与抒情的绝缘,带来文学对人的情感世界

① 滕守尧:《〈艺术〉前言》,见〔英〕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10页。

表现的单调与乏味,人们似乎对人的精神生活中“诗”的消失已经麻木,甚至感到中国文学发展中“诗性”之不足几乎是必然的;相应地,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更是从这样一种独立发展不足的散文观念出发去认识和理解“诗”的。但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欧洲 19 世纪文学恰恰是通过“诗”与“散文”的分裂获得更大发展的,“散文”独立发展出更具现代意义的叙事文学即长篇小说,诗歌则要求“纯粹化”而独立发展出象征主义诗歌,这种分裂和独立发展孕育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整个西方文学的新的变化。在我看来,在“五四”那一代作家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穆木天和沈雁冰对此有更敏锐的感应,这和他们与法国文学的特有联系直接相关。沈雁冰对法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有特殊关注,但他缺乏对法国文学的整体感受和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散文”与“诗”的分裂中出现的更具有独立性的一种小说;他通过《子夜》的创作有了一些明确认识,这推动了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独立发展,他创造的整体反映时代和社会的“现代长篇小说”形式,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在他个人的特殊境遇中与法国象征诗不期而遇,对此从感性到理性有了认识,他最早发出了让中国新诗回到“诗”那里去的声音,《旅心》就是“五四”后出现的力求摆脱散文束缚的一种“诗”的创作尝试,《谭诗》提出并阐释了“诗”与“散文”的根本不同,实现了中国新诗审美形式最初的理论建构,反映了他对欧洲文学“诗”与“散文”分裂有更清楚的认识。在这里必须提出的是,穆木天 1926 年回国后写出的《写实文学论》,是被我们的研究长期遮蔽的一篇重要文章,需要结合同时代写的《维尼及其诗歌》来理解,体现了他在中国文学语境中思考和认识的发展深化:不仅提出“诗”与“散文”的相通,而且通过对维尼的认识进一步提出从“散文”到“诗”的诗歌发展路径。在我看来,“诗”的独立发展和从“散文”到“诗”的发展,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诗歌主要的两种发展方式。但是,“五四”背景下发生在穆木天身上的这样一种具有中国文学整体革新意义的现代审美意识和诗歌发展思路,特别是他对“诗”与“散文”关系的独立思考,并没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歌产生多大影响,相反,在 1928 年革命文学倡导以及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变化中发生了蜕变,这种蜕变反而使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了某种代表性和典型性,是通过一种悖论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他思想观念上的“弗理契话语”夭折了他的诗

歌创作的发展,由其作为中国诗歌会的“老诗人”的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左翼诗歌,另一方面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发展体现的正是他在《写实文学论》中提出的诗歌发展思路,但却是通过一批更为年轻的左翼诗人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来的,而直接影响了他的左翼诗歌创作的变化;一方面,投身左翼文学的穆木天发生了以外国文学翻译为主的身份转换,他通过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叙事特征的认识深化,转向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于中国左翼文学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一个重要方面即体现在对巴尔扎克的认知上,他的《人间喜剧》翻译和阐释无疑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和阐释又是通过压抑他自身的“诗人的素质”实现的,如我们所看到他的巴尔扎克翻译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相反,他三四十年代不多的诗歌翻译反而折射出他“诗人的素质”的某种升华和发展。这是穆木天自身的悖论表现,同时更是中国文学整体上的悖论表现。这种情况更集中体现在穆木天1931年后的左翼文学批评中,诸如对他前期产生更大影响的维尼与他后期给予更多肯定的雨果,他前期自然倾心的法国象征主义与他后期更注重的法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在法国文学发展中是统一的,但在他前后期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中却表现出分裂乃至截然对立的特点,这反映了他的左翼文学批评不是在前期文学批评基础上承续性地发展起来的,而是断裂性地发展起来的,是通过“弗理契话语”对他前期的否定发展起来的,这带来他的左翼文学批评整体上的龟裂感,社会学批评与诗歌艺术批评之间的“二律悖反”,即在他的批评中诗歌社会性认识的增强却导致了他几乎无法展开诗歌艺术形式分析,他偶尔从诗歌艺术本身出发展开的批评又反映出他难以真正认识诗歌的社会性。这种现象不仅在创造社作家中十分典型,在西方文学直接影响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十分典型,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严重不足,即外在的变化总是大于内在的变化,形式的变化总是大于内容的变化。显然,认识这样一种“典型现象”,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局限于我过去的更具有“内向性”的“五四”研究,左翼文学的生成及其三四十年代的发展以至1949年后的变化是必须面对的,对此的思考和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典型现象”又需要结合鲁迅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并带来思维方式和阐释方法的变化,这也正是我近两

年来所追寻的。同时,本书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一“典型现象”,又充分意识到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本身对破译这一现象几乎难以避免存在的局限,在阐释中力求再现和保留现象形态原本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留下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更主要的是,写完本书,我更加切实地感受和认识到,在我们看来似乎已经“穷尽”的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蕴涵着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而有待于我们重新发掘、认识和阐释;当然,这些为“五四”所孕育、为1930年代左翼文学所发展的资源,如本书所示,在近一个世纪几乎“十年一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影响下,现象形态发生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内涵也相应地变得更为丰富与复杂,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此重新认识和阐释的难度。但是,面对时至今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语境”所滥觞的中西话语对我们无所不至的影响和异化,又使我们不能不立足于“五四”,不能不立足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这更是在直面现实中向“五四”和左翼文学的自觉回归,如本书所示,重新发掘、认识和阐释“五四”和1930年代孕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而言是必要和重要的,我甚至感到,我们几乎只能通过这样的发掘、认识和阐释,才可能获得抵御有悖于我们生存体验的外在话语压迫的力量,才可能获得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而有更是以立足于“五四”的独立话语方式存在于这个斑驳陆离的世界中并得到成长的可能。

穆木天上个世纪30年代在《法国文学史》这部著作中,不无感慨地引用了他翻译的法国诗人维尼的《命运集·海上浮瓶》这首诗,这首诗使他与维尼结缘,与法国象征主义结缘,但这首诗恰恰是维尼感受中的人类的、一个民族的和个体的人无法回避的运命的象征。穆木天概莫能外,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也维尼,“败”也维尼,他与维尼的不解之缘恰如这“海上浮瓶”,“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玩笑”,这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运命“残酷性”的表现。为了使这样的运命更少发生,或者说,为了使已经发生的历史不致平白而过,我借《命运集·海上浮瓶》中的诗句来与研究者们共勉——

……勤劳的思想家们呀!

你们永不要怕风浪去航海去罢，  
去找那由宝贵的封腊封着的一切的宝藏罢，  
纯金是会浮出来的，它的光荣是确定了的。<sup>①</sup>

2006年9月16日初稿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两个月后在“评估”声中改定

---

<sup>①</sup> 穆木天：《法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5月版，第260—261页。